

文化模糊性： 以越南南部地區華人節慶文化為例

阮玉詩

NGUYEN Ngoc Tho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文化學副教授，主修越南和東亞地區哲學、民俗與社會禮儀研究，曾在中山大學（2008）、哈佛燕京學社（2017–2018）、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8–2019）、波士頓大學（2019–2020）、布蘭迪斯大學（2020–2021）當訪問學者。阮玉詩是七本書、十幾個書章以及40多篇在越南和國外發表的期刊論文的作者，譬如《東方龍文化》（2016）、《越南湄公河地區天后信仰》（2017）、《中國文化教程》（2017）、《儀式與儀式中的象徵》（2020）、《落地生根：越南南部華人禮俗文化的保存與變遷》（2022）、Confucianism in Vietnam (2020);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Building among th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Vietnam: a view from Ritual Transformation in Popular Religion (2024); The ritual incorpo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amau,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the Tianhou cult (2021); Basic Thoughts of Vietnamese Classic Aesthetics through Văn đài loại ngữ (雲台類語) by Lê Quý Đôn (2021), Ritual formaliz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the cult of 108 Chiêu Ứng Anh Liệt of the ethnic Hainan Chinese in Vietnam (2022), etc.。



Journal of East Asian Religions and Cultures Vol. 1. Issue 2 (June 2024): 115–131
© 2024 by the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s, Daejin University, South Korea

<https://doi.org/10.23239/JEARC.2024.1.2.115>

Day of submission: 2024.04.06.

Completion of review: 2024.05.30.

Final decision for acceptance: 2024.06.20.

P-ISSN: 3022-0335

E-ISSN: 3058-2105



JEARC 2024,1(2): 115–131

Original Articles

Correspondence to

NGUYEN Ngoc Tho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Ho Chi Minh City
poettho@gmail.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0-0001-9386-0509>

Abstract

Culturo-Ambiguity: Case Studies of the Ethnic Chinese Festivals in Southern Vietnam

Culture not only embodies the depth of thinking summarized in the long cultural history of a society (community, nation), but it is also expressed daily through social transac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o-cultural context or multiple socio-political "narratives," many cultural practices fall into the so-called "culturo-ambiguit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valuat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refer to the community standard framework, resulting in disconne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is article uses a poststructural perspective and fieldwork data to discuss and propose a theory of culturo-ambiguity.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indicate that culturo-ambiguity can occur anytime and anywhere, but that states of culturo-ambiguity occur more frequently as social groups adapt to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s and as communities' subnarratives are "presented" and "performed." There have been many historical fluctuation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Vietnamese (the Kinh ethnic group) in Vietnam and the ethnic Chinese (the Hoa ethnic group) in Vietnam; therefore, in many cases, culturo-ambiguity has made many valuable contributions.

Keywords: culturo-ambiguity; beyond tradition; cultural exchange; Ethnic Chinese; Festival

文化不僅體現在社會悠久的文化歷史中概括的思維深度，也透過日常的社會互動表現出來。在社會文化脈絡或多重社會政治「敘事」的影響下，許多文化實踐陷入文化模糊狀態，其有效性難以評估、難以藉鑑，導致社會紐帶處於脫節狀態。

本文運用後結構視角與田野資料來討論並提出文化模糊理論。初步調查表明，文化模糊性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當社會群體適應經濟、文化和社會變化以及其子敘事被「呈現」和「實現」時，文化模糊狀態的發生頻率會更高。在越南華-越文化交流過程中，出現過許多歷史波動，很多時候文化模糊做出了許多寶貴的貢獻。

關鍵詞：文化模糊性、超越傳統、文化交流、華人、節慶

一、引言

根據通俗理解，文化概念被理解為社會（國家、民族）透過生存、創造生活活動、價值判斷以及源源不絕的國家管理者和知識分子的歷史過程所累積的價值觀和規範(Tran 2001)。但細究起來，這種所謂的「文化傳統」卻存在著許多模糊性，其存在期間的價值難以評價。文化生活的現實並不總是按照國家管理層或社區知識分子預先確定的功能模式運作。在許多情況下，社區故意創造一種文化模糊狀態來解決一些緊迫的內部問題。

當新舊交織、社會發生變化、文化過濾和磨練的過程尚未完成時，文化模糊性最自然地出現。在對越南華人社區的實際研究和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在許多情況下，這種過濾和銳化過程的最後產物是文化模糊性。由於為了傳達隱藏的敘事而產生的文化模糊性，社會群體往往無法充分認識到他們的屬性；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文化模糊性成為集體記憶和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應該成為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運用後結構視角和文獻分析，結合越南南部華人社區書面和實地文獻的綜合分析，特別是觀察與華人社區公共崇拜相關的節日文化，討論並提出文化模糊理論。筆者對越南南部民俗的考察表明，文化模糊性對當地華人文化的發展和走向整體社會的進程做出了許多寶貴的貢獻。在這項工作中，筆者討論了「文化模糊」概念，考察了它在越南華人節日文化中的表達，並討論了一些相關的理論問題。

二、“文化模糊”概念

古代中國人和東亞人將文化概念理解為美/價值體系（最高為真、善、美的價值），以及提煉、完善、將非價值轉化為價值的過程（根據《說苑》一書）。可見，東方詞源學對「文化」一詞的理解本身就包含兩個面向：穩定價值和文化過濾、磨練和完善過程中的中間價值。在西方文化中，文化的原始概念是拉丁文(kultura)，它有多種不同的意義，強調自我修養、人格修養、道德和社會教育等要素。東西方社會早期對文化的理解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都強調培養文化的角色。

今天，許多西方作家關注文化對特定生活實踐的當代意義。作者克利福德·格爾茨(Geertz 1973, 198)和皮埃爾·布迪厄(Bourdieu 1977)關注文化實踐的當代意義，從而關注文化實踐的過程本質(Geertz 1973, 1)。將文化視為由人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皮耶·布迪厄(Bourdieu 1977)認為，文化是組織生活的實踐體系，是創造文化習性(habitus)的要素。本文無意重新定義「文化」概念，而只是將研究問題置於當代生活實踐的參照框架中，即理解生活實踐在當代脈絡下的價值與功能。

「文化模糊性(culturo-ambiguity)」概念作為一個學術術語，在國際科學論壇中尚不存在，因此尚未明確定義。在世界範圍內，許多作者使用「文化模

糊性 (cultural ambiguity)」一詞來討論價值模糊狀態下的文化問題，但沒有討論其本體論或將其用作學術術語。羅伯特·哈里森和凱文·托馬斯在《消費者文化理論雜誌》(Harrison III and Thomas 2014) 上發表的「協商文化模糊性：多種族認同和消費的現象學研究(Negotiating cultural ambiguity: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f multiracial identity and consumption)」一文和阮國榮(Nguyen Quoc Vinh)在《越南研究雜誌》(2015年)上的「模糊性：對裴英晉小說的新歷史主義解讀(Cultural ambiguity in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representations of homosexuality: a new historicist reading of Bùi Anh Tấn's fiction)」一文都提到了「文化模糊性」一詞。然而，他們只將其用作中心詞「ambiguity」和形容詞「cultural」之間的複合詞組合，而不是作為特定的學術術語(culturo-ambiguity)。在東亞和越南，在討論某些社會實踐意義的模糊性時，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文化模糊性，但尚未有人將其作為一個學術術語使用。

在人類與生態關係的研究中，「生態模糊性 (ecoambiguity)」一詞是哈佛大學學者凱倫·索恩伯格(Karen Thornber)在其 2012 年出版的著作《生態模糊性：環境危機與東亞文學(Eco-ambiguity: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East Asian literatures)》中首次提出。她認為，許多文化、很多時代的人們都沒有將自然視為一個獨立存在、與人類具有平等地位的客觀實體。很少有一些被認為是進步的思想和觀點出現，例如「天人合一」的觀念（東方）和「地球母親」的觀念（西方），但實際上，人類一直在塑造這些觀念來為自己的生活服務，完全不是為了大自然本身。隨後，Scott Slovic, Swarnalatha Rangarajan 和 Vidya Sarveswaran 等作者在《生態模糊、社區與發展：走向生態批評的政治附加價值(Ecoambigu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 toward a politicized ecocriticism)》(2014)在分析西方生態論述時也使用了這個術語。在越南，黎氏玉蝶 (Le Thi Ngoc Diep)和 阮玉詩(Nguyen Ngoc Tho) 兩位作者在 *Revisita de Investigaciones Universidad del Quindío* 期刊上發表的「當代越南的生態模糊性與旅遊業發展——以越南南部高棉族村莊為例(Ecoambigu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Vietnam—Case study of an ethnic Khmer village in southern Vietnam)」一文中也使用該術語來討論越南茶榮省 Bà Om 池塘地區高棉人社群與地方當局之間的關係和解流程。

文化模糊性可以理解為尚未確定屬性、價值和意義的狀態；因此，文化模糊性可以被想像為一種或多種文化實踐尚未將屬性和價值分開的狀態。在實踐中，有些案例不能被認為具有直接價值，但卻具有間接價值，需要按照靈活的、「超越傳統」的空間、時間和主體框架進行評估。一種文化習俗此時可能對一個社區有價值，但可能對另一個社區或在另一時間對同一社區沒有同樣的價值。由於其價值體系和社會意義的模糊性，如果僅依據傳統固定的標準，往往很容易受到主觀的批評和評價。相反，這種「模糊」的狀態很容易為「傳統的創建」(Hobsbawm 1983/2002 年的概念)提供「機會」，其中包含著許多極其豐富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化和社會敘事。越南的這項研究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總之，「文化模糊性」是一種在內容和形式結構上尚未穩定的文化實踐狀態，其價值體系和特徵是暫時的，容易因社會的某些現實需求而改變。

透過創造力互動和超越自然是人類的天性。文化創造力已從許多角度（主要是西方作家）視為衡量一個社區面對社會變革的智力反應的標準。文化創造可能始於個人，但當它們證明了自己的價值時，它就會滲透到整個社會，逐漸成為集體無意識，參與歷史文化記憶的寶庫(Halbwachs 1992)。文化一旦被創造出來，其有效性還沒有得到充分證明，就陷入了文化模糊性。

在某種程度上，當文化實踐/思想出現在傳統價值體系框架之外時，文化模糊性自然就會出現。這在東方社會中更為明顯——那裡的社區關注傳統與當下之間的關係，並將文化理解為傳統規範/價值觀的體系。當非傳統元素形成並處於價值評估/再評估階段時，就會出現文化模糊性；因此，文化模糊是暫時的、相對的。文化模糊性是基於傳統規範的文化塑造和培育過程發生的語境，也是文化適應活動的“基礎”。

根據艾瑞克·霍布斯鮑姆(Hobsbawm 1983)的觀點，許多文化創造本質上是「傳統的創建(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行為。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傳統的創建」概念與傳統文化創造力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包含「宏大敘事」和國家管理賦予權力和控制的能力。許多「傳統創建」造成了長期或永久的文化模糊性，從而克服了文化模糊性的一個共同特徵：短暫性。可見，文化創造在許多情況下創造了新的敘事——文化模糊性的根源。

三、越南越-華二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模糊性

在越南國內而言，在各個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過程中，越南文化佔據主導地位，而作為少數民族的華人文化佔據次要地位。同時，在越南與中國國家文化交流場面上，中國文化顯然是「中心」地位，越南文化位於「外沿」之處。然而，前現代時期移民到越南和東南亞的華人社區主要帶來的是華南的民間文化，而不是整個中華文化框架。他們在越南與其他國家被視為少數，從而其文化成為次要傳統。當前越南與中國之間的國際文化交流，確實與越南國內背景下的越南人與越南華人的文化交流有一定關係；但國內情況肯定與國際情況基本上不同。長期生活在越南的華人已經「本地化」，其中一部分人已經變成「明香人」(Chiong 2013; Wheeler 2015)。自法國殖民以來，越南華人文化就與中國主流文化有所區別。在越南近三百年的歷史中，華人作為少數民族，一直努力向主流社會靠攏，文化特別是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都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華人移民到韓國、日本、歐美時，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本文基於討論越南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因此國際文化交流暫不屬於研究範圍。

目前，涉及一個國家各民族文化交流問題的理論架構與爭論較多；但由於論文範圍的限制，作者主要採用 John Berry (1983) 的觀點。John Berry 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認為，在文化交流和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小傳統與大傳統的選

擇之間至少存在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離(separation)和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四種不同屬性。根據社會歷史背景和民族心理，次傳統選擇最適合其社區的選項。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小傳統」社群將能夠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和社會普遍文化心理，主動創造文化模糊性，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溝通和文化交流並保證本族文化認同的流動。

越南本身歷史上是仿照中國政治的，在文化上受到中國人的影響，在政治上總是受到中國人的威脅。Buttinger (1968, 29) 詳細闡述了這種矛盾關係：「他們（越南人）越多地吸收中國的技能、習俗和思想，他們就越不可能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許多華人宗族「定居、幫助改變並最終被吸收到越南北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中」（Holmgren 1980, 72; Kiernan 2017, 100）。在越南的華人移民如果能證明自己希望在越南永久定居，就會被普遍接受。否則，出於國防原因，他們將受到嚴格的管理規定（Riichiro 1974, 140–175; Huynh 2018）。Wi-vun Taiffalo Chiung 肯定，這是當代越南社會華人社區的主導趨勢（Chiung 2013, 87–114），而 Charles Wheeler 則總結道：「新的身份影響了融合權利和製度規範，這些權利和製度規範定義了他們的社區，以抵制這一過程」（Wheeler 2015, 141–166）。華人真實地面對政治經濟地位的衰落。他們的[明香]身份元素至少仍然是在越南形成「少數精英」新地位的「有用工具」。

縱觀越南歷史，華人社區一直承受著相當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特別是在法國殖民時期、抗美援朝時期(1954–1975)和戰後十年。心理創傷引導華人他們選擇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良好發展策略：加強華-越文化交流，在越南「傳承」華民族文化資源。華人社區神明節日就是這一趨勢的生動而深刻的體現。以下是作者對越南南部華人社區不同民俗節慶進行實地考察和分析的四個案例。

（一）同奈省邊和市寶龍區的客家人三祖師節

目前越南有華人 72.3 萬人，主要居住在南部地區、中部沿海地區以及北部的河內、海防、廣寧等地。越南華人移民歷史悠久，但最值得關注的還是 17 世紀中下葉的「反清復明」浪潮。南部地區的華人大部分是自 17 世紀末以來移民的，其中包括來自同奈省邊和市寶龍坊的客家人。

越南南部各地的華人社區試圖創造和維持文化模糊性，以促進在文化交流和與社會融合的背景採取有效行動。同奈省邊和市寶龍坊（人口 1000 千名）的客家人村落成立於 320 多年前，他們以製作石、木、鐵工藝品為生；所以崇拜魯班、伍丁與尉遲公三祖師為代表神明。每年農曆六月十日至十三日，該村三祖師廟都會舉行三祖廟祭祀活動。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客家社區主動將傳統工藝三祖師神廟和節日更名為天后廟和節慶。其目的眾多，其中筆者的研究指出，最重要的因素是促進與其他華人方言社群（廣東人、福建人、潮州人等）和越南人的文化融合。客家社群捨不得放棄三百年歷史的三

祖師崇拜，只能在三祖師祭祀和節日期間繼續進行天后聖母祭祀活動，形成了「內師外聖」的特殊局面。在筆者連續三年的觀察下，此天后節並與天后聖母本身毫無關係(Nguyen 2020)，也就是說，原有的三祖師傳統節日活動將在天后聖母的名義下繼續發揚光大。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社區已經實現了它想要的：社會整合並保持其族群認同。但 COVID-19 疫情過後，在地方政府、學者和民眾的支持下，客家社區重新建造了新的廟門，並恢復了祖廟古廟的舊名「先師古廟」。正是這種持續的轉變，在人們（特別是朝聖者）接近神靈、與神靈互動的方式以及與寺廟神靈相關的節日中造成了文化上的模糊狀態。兩種不同傳統之間的模糊聯繫被機械地聯繫起來（三祖師崇拜和天后聖母崇拜），然後恢復了寺廟的名稱「先師古廟」，但節日的直接名稱仍然是天后節(筆者的田野調查 2023)。這種文化模糊性是由寺廟的客家管理團隊制定和維持的，他們積極創造和維持華人和越南人對神聖符號含義的不同理解和解釋(當地華人理解為三祖師崇拜但越南人理解為天后信仰)。社區中的精英和大眾之間也存在類似的模糊性：精英分子將其理解為手工藝村的傳統，而大眾則將其理解為一種普遍的民間信仰－天后信仰。據我們觀察，這種曖昧的局面是為了讓村里祖先崇拜的過渡過程能夠在一定時間內順利回歸到原來的狀態，避免香客和群眾的心中立即產生混亂。

（二）金甌潮州華人天后「上天與回鄉」

天后聖母信仰是華民族的主要民間信仰，與關帝信仰、福德正神信仰、本頭公信仰、三山王信仰等並列。全越南華人共有 150 多座天后宮，多數分佈於南部地區。近二十年來，一些越南家庭接受並建造寺廟供奉天后，但寺廟數量少，規模小，影響力幾乎不存在，而且他們主要採用觀世音菩薩的角色來看待天后(Nguyen 2017, 2022)。當華人辦理天后節的時候許多越南人過來參與，他們成為天后信仰普通進香者或是旅客，並非信仰圈的成員（這是越南人多神崇拜傳統的一種反映）。越南南部地區民間文化中最普及的母神崇拜主要為處主聖母信仰與靈山聖母信仰。因此，天后信仰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華民族特色。在越南，談到天后時人們聯想到華人社群；反而，談到華人信仰宗教時人們會談到天后、關帝、財神等神。

金甌省是越南最南端的省份，面積 5,331 平方公里，人口 142.1 萬（2019 年），其中華人約 8,000 人，大部分是潮州人，其次為廣東人、福建人、海南人。金甌華人主要供奉天后聖母，其次是關帝、觀音、財神等。一年一度的天后節是農曆三月二十三日（與中國、台灣和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相似）。不過，金甌市的潮州華人在大年初三晚上增設了迎天后聖母回宮儀式，以促進當地的華越文化交流。他們借用每年年底送灶神上天的傳說和風俗，以及越南當地邀請祖先過春節的儀式進行配合的祭祀活動。按照傳統，越南人民每年臘月二十三日都要舉行祭灶神升天的儀式；當地華人也在臘月二十四日舉行類似的儀式。金甌華人在市中心的天后宮當天也舉行送天后上天大儀式。

在他們眼裡，天后就是一位天官，她跟灶君一樣，年底必須上天執行任務，向玉皇大帝報告這一年來社會所做的事情（而灶君則負責匯報各家過去一年的事務）。臘月三十日，家家戶戶都要舉行儀式，迎接已故的祖先和灶君回家，慶祝新春佳節。他們並不歡迎天後聖母在這一天回到金甌過年，因為在當地華人精英眼中，天后聖母就像許多家庭的祖先一樣，必須「回家鄉」（中國福建湄洲島）與「子孫」共慶春節。大年初三早上，家家戶戶都要舉行儀式，送祖先回他們的地方。當天晚上，金甌華人聚集在天后宫隆重舉行大儀式，稱作「恭請聖母回宮」典禮。不少當地越南人和高棉人也過去參與其儀式。大年初三晚上在天后宫舉行的這場儀式活動吸引了數千名華人和越南人參加。上述每一個細節都是當地華人社區的一個「敘事」(narrative)，所有這些細節交織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模糊但有影響力的當地華越民族節日文化交流的圖景 (Nguyen 2022)。

(三) 平陽新城的天后節

平陽省位於胡志明市的北面，省會為土龍木市，目前是快速工業化的地方。平陽華人主要崇拜天后聖母，每年農曆正月十五、十六在土龍木市舉行大型的天后節，吸引百萬信徒，所以得名。2009年省政府決定成立平陽新城。平陽新城由該省工業發展和投資公司(Becamex IDC)設計與投資，在距離土龍木市約十五公里的地區建造。新城基礎設施，房屋、街道狀況良好，然而，經過幾年的發展呈現房屋經營不善局面，當地政府調查後發現，人們不願意在新城買房，因為沒有天后的保護和祝福。隨後，平陽新城開始興建規模宏大的新天后宮，並命令土龍木市華人社區負責在新城舉辦年度節慶。土龍木市的華人只好在正月初九舉行天后繞境儀式，但規模較小，參加的人也不多（多數人要等到正月初五、十六參加土龍木市天后節）。新城政府當然不樂意了，隨後千方百計將正月初九的天后繞境儀式組織成純粹的遊客式的狂歡節。參加過初九活動的人並不覺得這是一個與神明有關的節日，而簡直就像是一場街頭娛樂活動(Nguyen and Huynh 2023)。

(四) 藩切市關帝節

藩切市是平順省的省會城市，位於胡志明市東北 200 公里處。藩切市華人（約 7000 人）以越南中部海岸漁村越南居民「Nghinh Ông(儀式)」為名，在藩切市街頭舉行「Nghinh Ông Quan Đế (迎關帝爺)」節。「Nghinh Ông」的概念引起了遊客和許多普通民眾的誤解，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沿海社區崇拜魚神的儀式。這個節日規模宏大，吸引了大量越南當地越、華民眾以及遠近遊客；然而，對於上述 Nghinh Ông 節的名稱，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 (2023 年實地考察資料)。無論如何，這種模糊性在某種程度上對促進當地乃至整個社會的越華二民族文化交流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由上可見，文化模糊性的案例研究均與社區神明節日有關。為什麼會這樣呢？使文化模糊性在上述所有四種情況下都有效的因素可能是由於儀式的閾限性(liminal) 以及所有參與者在儀式/節日中體現出的共感狀態(communitas)、共享經驗/經歷(shared experience) 和真誠(sincerity) (Turner 1969; Seligman and Weller 2012)。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 1969)認為，當公共集體超越儀式的閾限門檻並達到集體共感狀態時，儘管個人背景、社會階層和種族存在差異，但他們變得更加親密。Adam Seligman 和 Robert Weller (2012)進一步發展了共感、分享經驗和真誠的三理念，這三個因素都有助於在儀式團體的成員之間建立親密和團結，儘管在理解和感受神的神聖性以及對象徵意義的解釋方面仍然存在差異。兩位作者稱之為一種曖昧/模糊的狀態，一種介於親密和全心全意的交流之間的假死狀態，在真誠的湧動中暫時忘記了差異。越南和華人透過上述儀式進行文化交流和社會融合，經歷了這個過程。可以說，少數民族社區內的精英積極創造文化模糊性，以保持理解/解釋象徵和儀式/禮儀的神聖性的方式的多樣性，從而促進相互的情感和文化交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畢業典禮、升旗/敬禮儀式、感謝老師、紀念烈士等社會儀式都經歷著這些重要的情感。因此，表達/實現某種敘事的需要是文化交流和文化適應中創造和維持文化模糊性的重要驅動力。

四、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模糊性

(一) 文化學、文化研究的屬性

越南學者陳玉添(Tran Ngoc Them)認為，文化學/文化研究是一門與社會科學接壤的人文科學。文化學研究對象為文化整個價值體系，其研究方法主要靠質性方法為主。該科學是一門跨學科，涉及的領域廣泛，要求研究的高通用性很強(Tran 2001)。中國學者周洪宇與同仁(1987)認為，文化學是在其他專門科學的基礎上專門研究文化系統內部組成部分之間相互關係以把握文化系統的品質、特徵、內容、形式、結構、功能、類型，最終從中可以推導出文化發展最普遍的規律。這兩個定義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找到了文化發展最普遍的法則。也就是說，文化研究總體上忽略中間因素，即「新興文化動態」和「超越傳統(beyond tradition)」因素。然而，這僅適用於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以現實問題為研究對象的應用文化研究分支不能忽略這個中間環節以及中間價值體系。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正確認識、解釋和解決文化模糊一問題，才能看到生動的生活圖景，並明白需要科學的理論指導和與社會實際問題的靈活結合。那麼，我們可以運用哪些觀點和理論來研究文化模糊性呢？

文化模糊性與社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包含「敘事(narrative)」和「超越傳統」成分。它需要採用後結構主義/後現代的觀點來研究各種文化現實。這種觀點使研究人員能夠在分析和評估問題時應用文化相關的觀點，使他們能夠根據文本和數據分析的結合不斷解釋和重新解釋基於文本分析和實際調

查資料的結合數據,其中強調「超越傳統」、「新興文化動態 (emerging cultural trends)」、「新创建的生活实践(newly-created life practices)」和「不穩定的文化現實(unstable cultural reality)」各種因素。我們可以以金甌潮州華人在大年初三舉行的歡迎天后回宮的隆重儀式為例。這堪稱一個「超越傳統儀式」或「新創傳統」的案例,需要學界認真研究。越南和東亞地區正經歷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在新技術和新文化潮流的推動下,文化和思想必然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和調整,換言之,我們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各種超越傳統的社會動態。作為少數民族的華人社群也不例外。從結構功能的角度來看,這些「超越傳統」元素往往被歸類為非價值群體或文化變遷群體,無法進行充分的價值分析,因而容易被忽略。這種「超越傳統」其實可以是「傳統的創造(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過程的產物,也可以是公眾評價/重新評價歷史文化記憶時「當下主義」思維(the presentist mindset)的產物,或者是精英推動和實施的社會銳化和重組過程的產物。目前文化研究中的後現代思維可以被視為對錄達/反映文化的「超越傳統」方式的實驗視角,其特別關注文化實踐中嵌入的「微觀敘事(micro-narrative)」而不是「宏觀敘事(macro-narrative)」。

換句話說,文化模糊性可能包括參與所考慮的社會文化實踐的社區和利害關係人的多樣性(diversity)和多元話語性 (multivocality)。因此,文化模糊性的研究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社會自由主義和文化創造性思維的研究/評估工具和方法,有助於鞏固和傳播多元文化思維。事實上,只有透過對金甌華人社區的深入田野研究和仔細分析,我們才能了解他們在創立正月初三晚上與越南當地灶神習俗相結合的天后祭祀儀式時所隱藏的話語和意義。如果不採用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和/或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學術界就無法理解金甌當地華人社會的自我敘述,當然,也沒有為地方當局深入了解和引入關注少數族裔社區多元化和多元話語的管理政策提供建議。

(二) 研究文化模糊的一些理論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傳統的創建(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理論(1983)允許研究人員評估「非常規(non-standard)」、「不穩定(unstable)」、「非結構化(non-structural)」要素,使他們知道如何將其置在該領域的背景和實際需求中,同時為面向話語/「敘事」分析和利害關係人多樣性的研究提供基礎。

莫里斯·哈爾布瓦克斯(Halbwachs 1992)和皮埃爾·諾拉 (Nora and Krizman 1996)的文化記憶理論強調文化記憶的集體作用。某種文化展示最初可能是個人創造的,後來被集體認可和使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它就成為一種文化記憶。此外,該理論強調記憶和解釋的當下主義,對不同時期人們的記憶進行評價,從而創造了記憶領域和記憶解釋領域。這種觀點有效地支持了文化相對性的識別以及與所考慮的文化實踐和研究人員當代背景相關的思維。

象徵解釋理論遵循查爾斯·皮爾斯、尤里·洛特曼等人的三元符號解釋模型（符號、所指的、基於上下文的符號解釋），其中研究者關注象徵解釋的作用以及解釋者自身特定的歷史、意識形態、社會背景，同時，它允許解釋者「解構」先前穩定的意義與價值體系，在文化模糊的狀態下考慮問題，並找到控制該符號形成和發展過程的力量和因素。藉由哈爾布瓦克斯(1992)、諾拉(1996)的文化記憶理論，以及皮爾斯和洛特曼的符號學理論，學界能否理解同奈省客家人為何會犧牲族群原本祭拜先師的傳統，而以天母信仰與節日來覆蓋，在近年逐漸恢復原有先師崇拜傳統。每一個舉動都有其意義，而最大的目的，就是堅持保留傳統（文化記憶）並實現社會融合。相反，在平陽新城設立新的天后宮、將土龍木市的舊天后宮遷至平陽新城兩件事情可能會破壞平陽華人社群的歷史文化記憶；同時，平陽新城的新成立天后節已被學界視為不成功、無效的「傳統的創建」現象。

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的儀式理論(1969)以及作者塞利格曼(Seligman)和韋勒博(Weller 2012)的跨越門檻(liminal)、分享共同經歷(shared experience)和群體意識圖(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理論，強調了心理學中的模糊狀態—集體意識參與，這有助於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共情與團結，同時推動各個社群之間的感情交流與文化交流。金甌市大年初三晚上，華、越、棉三個團體聚集在天后宮，耐心等待參加聖母回宮的盛大儀式。他們一起跨過門檻，一起產生了一種自然覺醒的純粹的真誠和情感，以促進彼此之間親切和友誼的感覺。目前，越南許多重大信仰宗教節慶均由地方政府資助和推動，其目的多種多樣，包括促進民眾情感交流、社區團結、旅遊業發展等。目前，越南學術界善於運用當前國際上流行的禮儀學新理論、新觀點進行研究，強調信仰宗教節日的道德和社會價值體系，逐步糾正戰後社會主義高潮時期對信仰宗教及與信仰宗教相關的節日的誤解。

文化呈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和文化表現(Cultural Presentation)理論也使研究人員能夠根據設計者和演示者的想法來感知和評估被呈現/表徵的結構[它們的背後是設計者/演示者的「敘述」、計劃、管理策略、領導力或「自我授權」]，從而辨識文化模糊性和價值體系及其在運作和發展活文化景觀中的意義。原始的天后節在平陽省土龍木市舉行，是一種純粹的文化表達，每年自然而有活力地舉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朝聖者和遊客的關注和參與。另一方面，平陽新城新設立的天后節只是一種刻意的文化呈現（新創造的現實），根本不包含人民的內心和願望。它的活動是一種文化表徵，所以當表徵效果不好時，主辦單位就會重新組織、反覆表徵，至今已成為一種休閒娛樂節日。文化表徵常導致文化模糊性。藩切市的中國關帝節有兩個屬性：文化表達和文化表徵。文化表現（原始關帝節及相關的宗教儀式、藝術表演和其他民間活動）可以促進當地華人的民族認同和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同時，文化表徵（節日名稱與越南漁民的魚神節相同；某些禮儀融入了漁民節的某些細節等）有利於促進各民族間文化和情感的交流。

文化變遷也帶來文化模糊狀態。根據 Nguyen Thi Phuong Cham & Do Lan

Phuong (2016, 15) 二位學者的闡述, 文化變遷是「文化變遷的形式和文化要素為文化整體創造出新的色彩, 並對經濟、政治和社會動態過程, 特別是一體化過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和乾預的過程, 現代化和全球化」。文化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和價值框架, 建構了新的模式 (Parsons 1971)。當新模式的評估標準尚未建立或標準化, 不同的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時, 難免會遇到文化模糊狀態。文化變遷是一個過程, 因此文化變遷所帶來的文化模糊性當然是暫時的。儘管它的出現和存在的時間很短, 但文化模糊性在文化變遷過程中有其自身的功能, 尤其是實驗性中間價值框架的作用, 有助於新標準價值體系的細化與成立。上述同奈省邊和市客家人三位祖先崇拜的變遷和過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前越南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導致各民族禮儀文化發生變化, 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文化模糊現象。

為了能夠有效地研究文化模糊性, 研究人員需要參考、比較和結合文化沉積/傳統的分析與文化實踐的多樣性/多重性。研究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模糊性可以更密切地觀察和評估文化實踐, 關注相關各方之間的文化氣息、「商榷」、「和解」, 為批判性思維和多元文化思維鋪平道路。文化模糊性是流行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 是東亞、越南和世界之間文化學/文化研究學術交流和對話所必需的, 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筆者在平陽省土龍木市進行深入訪談時發現, 當地華人社群用聰明的智慧來回應地方政府的政策。如前所述, 平陽省政府曾要求華人將天后宮從土龍木遷往平陽新城, 但華人擔心此舉會破壞當地華人的歷史文化傳統, 因此拒絕了這項要求。他們採取一種儀式化的方法來處理這種情況。他們編造了一個凡人無法強迫的故事, 說有一天, 土龍木的華人各幫會 (各華語方言社團) 代表聚集在天后宮舉行抬轎儀式 (恭請天后像遷入平陽新城的新天后宮), 但天后像變成太重, 九個童女也無法抬起轎子。由此可見天后聖母是不願意動的, 這個故事也就在外面的民間廣為流傳, 很快就成為了人們心目中公認的故事。地方政府無法實施天后宮遷建計劃, 只好在平陽新城設立新天后節, 後來演變成農曆正月初九的娛樂節。因此, 文化模糊性往往蘊含著社群的微觀敘事, 文化研究者若沒有對其話語的透徹理解, 就無法體會文化模糊性的意義與價值。

五、結論

文化模糊性是文化研究中一種非永久性但並不罕見的狀態, 特別是在對出現「超越傳統」和「新興文化動態」因素的社區和社會的案例研究中, 例如社會變遷必然導致文化變遷、文化交流-文化適應等過程、文化創意、國外文化浪潮的引進等。上述華人文在越南南部發展所造成的文化模糊 [同奈省客家人把先師廟和先師節改為天后古廟和天后節, 然後逐漸回歸原來的三祖節; 金甌市潮州人按照越南年底送和接灶君之風俗創建了年底天后聖母上天與回鄉風俗; 平陽省土龍木市的華人為了抵制地方政府將天后廟遷往新居的要求, 創造了一個傳說, 使得平陽新城不得不設立新的天后節; 潘切市

華人採用越南漁民們迎魚神 (Nghinh Ông) 節日之名稱來為本社群關帝廟會起名為 Nghinh Ông Quan Đế 節等], 顯然具有價值體系, 有助於促進越南華越兩個民族的文化和情感交流。文化模糊性需要應用自由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多元文化思維, 以及關注文化物件在研究問題和思維中的作用的子理論。文化模糊性是表達和強調「微觀敘事」的脈絡; 因此, 文化模糊性有助於激發文化研究的活力。文化模糊性需要作為一個具有後結構主義觀點和相關理論體系的專業術語來認識。

Acknowledgement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iet 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o Chi Minh City under grant number NCM2023-02.

Conflict of Interest

本論文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

References

- Berry, John W
1983 "The Sociogenesis of Social Sciences: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Sociogenesis of Language and Human Conduct*, 449-458. Springer.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Buttinger, J.
1968 *Vietnam;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 Chiung, Wi-vun Taiffao
2013 "Identity and Indigenization: Minh Huong People versus Ethnic Chinese in Vietnam."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9(4): 1–26, [Chinese Language Text] 蔣為文,《越南的明鄉人與華人移民的族群認同與本土化差,《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rison III, Robert and Kevin Thomas
2014 "Negotiating Cultural Ambiguity: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f Multiracial Identity and Consumption." *Consumer Culture Theory* 15: 41–56.
-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mgren, Jennifer
1980 *Chinese Colonisation of Northern Vietnam: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Tongking Delta, First to Sixth Centuries A.D.*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Huynh, Ngoc Dang
2018 *History on Government Policy to Chinese People in Vietnam*. Ho Chi Minh City: Tong hop. [Vietnamese

- Language Text] Chính sách của các vương triều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người Hoa.
- Kiernan, Ben
2017 *Việt Nam: A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 Thi-Ngoc Diep and
Nguyen Ngoc Tho
2021 “Ecoambigu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Case Study of an Ethnic Khmer Village in Southern Vietnam.” *Revista de Investigaciones Universidad del Quindío* 33(2): 74–85. <https://ojs.uniquindio.edu.co/ojs/index.php/riuq/article/download/515/682>
- Nguyễn, Thị Phương
Châm and Đỗ Lan Phương
2016 *Suburban Village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Xuân Đỉnh Village, Từ Liêm District, Hanoi City)*. Hanoi: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Vietnamese Language Text] Làng ven đô và sự biến đổi văn hóa (trường hợp làng Xuân Đỉnh, huyện Từ Liêm, thành phố Hà Nội).
- Nguyen, Ngoc Tho
2017 *The Thiên Hậu Belief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Hanoi: National Political Publishing House [Vietnamese Language Text] “Tín Ngưỡng Thiên Hậu Vùng Tây Nam Bộ.”
- 2020 “Hakka Identity and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Vietnam.”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Special issue on “Ethnicity, Ritual and Festivals in Asia”*, edited by Oscar Salemink and Siuwoo Cheung 9(1): 56–66.
- 2021 “The Ritual Incorpo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amau,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the Tianhou Cult.” *Culture and Religion* 22(1): 6–24.
- 2022 *Taking Root wherever you land: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itual and Customary Culture of Chinese People in Southern Vietnam*. [Chinese Language Text] 阮玉詩, 《落地生根: 越南南部華人禮俗文化的保存與變遷》, 台北: 亞細亞國際傳播社。

- Nguyễn, Ngọc Thơ and Huỳnh Hoàng Ba 2023 “Cultural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Life: Social Articulation in the Worship and Early Spring Festival of Thiên Hậu in Bình Dương New City.” *Vietna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o Chi Minh City: VNU Press. [Vietnamese Language Text] 《Di sản văn hóa trong đời sống đương đại: tính khớp nối xã hội trong tục thờ và lễ hội Thiên Hậu đầu Xuân ở thành phố mới Bình Dương》, 《Việt Nam trong thế giới đương đại》.
- Nguyễn, Quốc Vinh 2015 “Cultural Ambiguity in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Representations of Homosexuality: A New Historicist Reading of Bùi Anh Tấn’s Fiction.”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10(3): 48–86.
- Nora, Pierre and Lawrence D Kritzman 1996 *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Redfield, Robert 1956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ichiro, Fujiwara 1974 “Policies Towards Chinese Migrants of the Vietnamese Dynasties.” *Archaeological Journal* 8: 140–175. [Vietnamese Language Text] 《Chính sách đối với dân Trung Hoa di cư của các triều đại Việt Nam》, 《Khảo cổ tập san》
- Slovic, Scott; Swarnalatha Rangarajan, and Vidya Sarveswaran eds. 2014 *Ecoambigu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 toward a politicized ecocriticis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Seligman, Adam B and Robert P Weller 2012 *Rethinking Pluralism: Ritual, Experience, and Ambig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rnber, Karen, et al.
2014 *Ecoambigu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 Toward a Politicized Ecocriticis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Trần, Ngọc Thêm
1996 *Rediscovering Vietnamese Cultural Identity*. Ho Chi Minh City: Tổng Hợp Publishing House. [Vietnamese Language Text] 《Tìm về bản sắc văn hóa Việt Nam》.
- Turner, Victor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 Wheeler, Charles
2015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y: Strategic Adaptation and the Ethno-Evolution of Minh Hương (Central Vietnam), 16th–19th Centuries.” *Itinerario* 39(1): 141–166.
- Zhou Hongyu, Cheng Qihao, Yu Huaining, Xiong Jianhua.
1987 “Sever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Chinese Language Text] 周洪宇, 程啟灝 俞懷寧 熊建華. 《關於文化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華中師範大學期刊》人文社會科學版。